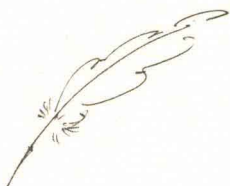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希腊肃剧注疏

刘小枫 ● 主编



[美] 阿伦斯多夫 Peter J. Ahrensdoerf ● 著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作中的理性主义与宗教

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Sophocles' Theban Plays

袁莉 欧阳霞 等 ● 译
崔崑 ● 校

华夏出版社

CAMBRID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希腊肃剧注疏

刘小枫 ● 主编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作中的理性主义与宗教

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Sophocles' Theban Plays

[美] 阿伦斯多夫 Peter J. Ahrensdorf | 著

袁莉 欧阳霞 蒋丹 江欣柯 | 译

崔嵬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作中的理性主义与宗教/ (美)阿伦斯多夫著; 袁莉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Sophocles' Theban Plays

ISBN 978-7-5080-7738-3

I. ①希… II. ①阿… ②袁… III. ①索福克勒斯 (前 496~前 406) —悲剧—戏剧研究 ②政治哲学—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3 ②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7167 号

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Sophocles' Theban Plays, 1st edition (9780521515863) by Peter J. Ahrensdorf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华夏出版社 2013.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华夏出版社.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销售。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176 号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

作者 (美) 阿伦斯多夫

译者 袁莉 欧阳霞 蒋丹 江欣柯

译校 崔 鬼

责任编辑 孙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印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89千字

经 销 新华书店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张 7.25

定 价 35.00元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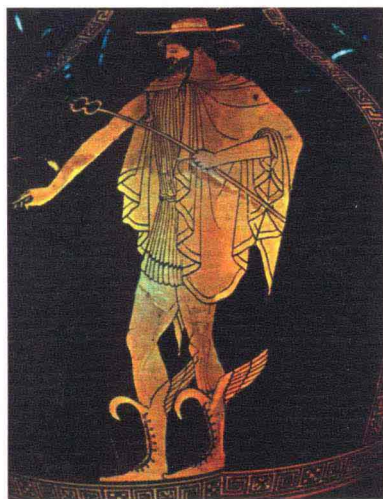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希腊肃剧注疏”出版说明

古希腊肃剧源于每年一度的酒神祭(四月初举行,通常持续五天),表达大地的回春感(自然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的巡回),祭仪内容主要是通过扮演动物表达心醉神迷、灵魂出窍的情态——这时要唱狂热的酒神祭拜歌。公元前六百年时,富有诗才的科林多乐师阿瑞翁(Arion)使得这种民俗性的祭拜歌具有了确定的格律形式,称为酒神祭歌(διθύραμβος = Dithyrambos),由有合唱和领唱的歌队演唱。古希腊肃剧便衍生于在这种庄严肃穆的祭歌之间有情节的表演,剧情仍然围绕祭神来展开。

我国古代没有“悲剧”、“喜剧”的分类,只有剧种的分类。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古希腊的 tragedy 译作“悲剧”,但罗念生先生早就指出,这一译名并不恰当,因为 tragedy 并非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戏剧。的确,trag- 的希腊文原义是“雄兽”,-edy(ἡ ᾠδή[祭歌])的希腊文原义是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合拼意为给狄俄尼索斯神献祭雄兽时唱的形式庄严肃穆的祭歌,兴许译作“肃剧”最为恰切——汉语的“肃”意为“恭敬、庄重、揖拜”,还有“清除、引进”的意思,与古希腊 Trag-edu 的政治含义颇为吻合。古希腊的 Com-edu 的希腊语原义是狂欢游行时纵情而又戏谐的祭歌,与肃剧同源于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假面歌舞表演,后来发展成有情节的戏谐表演,译作“喜”剧同样不妥,恰切的译法也许是“谐剧”——“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肃剧严肃庄重、谐剧戏谐浅俗,但在歌队与对白的二分、韵律及场景划分等形式方面,肃剧和谐剧基本相同。约定俗成的译法即便不甚恰切也不宜轻举妄动,但如果考虑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光景,来日方长,译名或术

语该改的话也许不如趁早。

古希腊戏剧无论严肃形式(肃剧)抑或轻快形式(谐剧),均与宗教祭祀相关。从祭仪到戏剧的演化,关键一步是发明了有情节的轮唱:起先是歌队的领唱与合唱队的应答式轮流演唱,合唱队往往随歌起舞——尽管轮唱已经可以展现情节,但剧情展示仍然大受限制,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演员,与合唱歌队的歌和舞分开,各司其职,从此,合唱歌队演唱的英雄传说有了具体的人物再现。起初演员只有一个,靠戴不同的面具来变换角色、展开戏剧情节。演戏的成分虽然增多,合唱歌队的歌和舞仍然起着结构性的支撑作用。

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tratus,约公元前600—前528)当政(公元前560年)后,把狄俄尼索斯祭拜表演从山区引入雅典城邦,搞起了酒神戏剧节,此时雅典正在加快步伐走向民主政制。创办戏剧节对雅典城邦来说是一件大事——有抱负的统治者必须陶铸人民的性情,为此就需要德育“教材”。从前,整个泛希腊的政治教育都是说唱荷马叙事诗和各种习传神话,如今,城邦诗人为了荣誉和奖赏相互竞赛作诗,戏剧节为得奖作品提供演出机会,城邦就有了取代荷马教本的德育教材。剧场与法庭、公民大会、议事会一样,是体现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机制——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总之,古希腊戏剧与雅典城邦出现的民主政制关系密切,通过戏剧,城邦人民反观自己的所为、审查自己的政治意见、雕琢自己的城邦美德——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宗教祭仪,但并非所有古代文明都有城邦性质的民主政制。古希腊肃剧的内容,明显反映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展现了民主政制中雅典人的自我认识、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的变化。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肃剧,与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演说术,同样没有意义。把古希腊戏剧当作一种普遍的戏剧形式来衡量我们的古代戏曲并不恰当,我们倒是应该充分关注雅典戏剧的特殊性及其所反映的民主政治与传统优良政制的尖锐矛盾。

古代戏剧的基本要素是言辞(如今所谓“话剧”),戏剧固然基

于行动,但行动在戏台上的呈现更多靠言辞而非如今追求的演技。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戏剧。结构主义人类学兴起以来,古希腊肃剧研究不再关注传世的剧作本身,而是发掘戏剧反映的所谓历史文化生态和社会习俗,即便研读剧作,也仅仅是为了替人类学寻找材料。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肃剧作品即便没有演出,也值得一读——人类学的古典学者却说,要“看戏”而非“读戏”,甚至自负地说,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懂肃剧。然而,后世应当不断从肃剧作品中学习的是古希腊诗人在民主政治时代如何立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肃剧诗人,岂见伟大的传世肃剧!不再关注诗人的立言,而是关注社会习俗,我们失去的是陶铸性情的机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即便如今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肃剧演出,也可以通过细读作品,“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

幸赖罗念生、周作人、缪灵珠、杨宪益等前辈辛勤笔耕,至上世纪末,古希腊肃剧的汉译大体已备,晚近则有张竹明、王焕生先生的全译本问世(译林版2007)。“古希腊肃剧注疏集”乃注疏体汉译古希腊肃剧全编,务求在辨识版本、汇纳注疏、诗行编排等方面有所臻进,广采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相关成果,编译义疏性专著或文集,为我国的古希腊肃剧研究提供踏实稳靠的文本基础。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年1月

何者为王？

崔 嵬

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让人怀疑：作为肃剧大师的索福克勒斯，是否亦是高明的哲人？诗制作影像，满足欲望，应是等而下之。索福克勒斯能否在诗中埋藏罕见的思想宝藏？如若没有，何以尼采、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等人均于此驻足？索福克勒斯自小厮混于戏剧界，曾担任歌队领队，也独得天资，拥有一副好嗓子，再加上，索福克勒斯亦热心政事，曾任财务官、将军、寡头委员等职，绝非空谈理论之辈。^①或许，索福克勒斯没有理论文字传世，当是故意而为：不愿书写显白的理论文字。

理解索福克勒斯的难度增大，如若施特劳斯字里行间的阅读方法成立，索福克勒斯必定会为细心的读者留下重大的线索。^②那么，阅读索福克勒斯不能放过每一种细小的可能。关注表面的文学手法，成为哲学思索的命题。索福克勒斯存世剧作并不太多，忒拜三联剧声名远播，历史久远。历史上应有其他忒拜剧作，均未完整留存下来，无法与索福克勒斯剧作直接对堪。^③但可以肯定，索福克勒斯对故事情节的选择有其独到的考虑。后世的研究，理应寻觅线索，尽力回到索福克勒斯的本意。如何发掘线索，领悟作者本意？

① 参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页115。

② 参施特劳斯著，《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

③ 参荷马，《英雄诗系笺释》，崔嵬、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2011。

阿伦斯多夫的研究文字,正显出此方面的努力。

如何展现索福克勒斯创作忒拜三联戏的意图?先来关注标题。奇特的是,明显的忒拜三联剧却在标题上并未提到“忒拜”二字。第一部《俄狄浦斯王》,其中“俄狄浦斯”并非索福克勒斯首创,一位名叫基纳厄同的人也写过类似的题目,名叫“俄狄浦斯之歌”。以此而言,“王(tyrant)”或更准确地译为“僭主”,成为三部剧作的标题中唯一点明俄狄浦斯身份的词,也是索福克勒斯故意为之,此举意在告知读者,该剧讨论的是“僭主”的相关问题,也即是“何者应为城邦之王”的问题。俄狄浦斯依靠人的理智,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成为忒拜僭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俄狄浦斯作为人之理智与人之力量的象征,以看似高贵的方式,维护着忒拜的统治长达15年,却最终走向失败。阿伦斯多夫发现俄狄浦斯理智行为的自私品质,虽能逞一时之意,却无法持久。本属哲人的理性主义,到治邦者手中,即所谓僭主手中,却成为实现私欲的工具。俄狄浦斯的理智为何是自私的?俄狄浦斯自私地追求着什么?阿伦斯多夫的论述基于对情节的细致分析,正欲解答此问题。

第二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俄狄浦斯不再是“王”,标题中也没有了“王”,而是成了一位被“解职”的国王。无论如何,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被解职均不是什么好事。被解职的政治人物,往往不会去从事别的事业,如思索哲学,而是尽力证明自己政治生涯的伟大,应得神恩。治邦者退休后总是爱写自传以为自己的行为申辩。^①不过,在忒拜三联剧中,此剧按故事情节而言正处于正中心,也是唯一一部在标题中指明地点的剧作。地点科罗诺斯有三个特别之处,第一是索福克勒斯的诞生地,第二是埋藏俄狄浦斯的地方,第三是后来的柏拉图学园建于此地。从时间上而言,第三点应与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无关,但索福克勒斯标题中点明的却似乎是一处

^① 参罗维著,《〈政治学〉中的目标和方法》(Christopher Rowe, “Aims and Methods in Aristotle’s *Politics*”, presented at a seminar at 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Washington, DC, In April 1975)。

“生死之地”。何者死？俄狄浦斯王死，不再活着，也未必能获永生。因为阿伦斯多夫发现此情节中，俄狄浦斯利用双重标准，对自己宽容，对他人严苛，盲目的昔日王者，没有真正变得虔敬，还是一如既往地自私。阿伦斯多夫发现，俄狄浦斯身上具有多重冲突：口中的高贵与真正的利己；回归虔敬信念与笃信理智；双重的理智标准；双重的愤怒态度。这些冲突指明，表面上放弃理智，拒绝理性主义的俄狄浦斯，并未能实现高贵，而是利用虔敬的说辞再次谋求自己的私利。何者生？索福克勒斯生，诗人生，也极有可能实现永恒。阿伦斯多夫看到与诗人最接近的戏剧形象竟然是忒修斯，原因在于忒修斯能高贵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或许诗人的伟大也正在于能深入地思索每类人，设身处地地为每个人物着想，这就是高贵。阿伦斯多夫立足情节的分析会让上述论断极具说服力。

第三部《安提戈涅》，标题中，“安提”意即“反抗”，而“戈涅”意即“出生”。安提戈涅要反抗自己的“出生”，实则应是反抗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知晓此名称是否为索福克勒斯首创，但此剧中对人反抗自然、反抗命运的描述却不绝于耳。借由此剧，略微用心的读者即能见识到人的狂妄。不过，剧中言论却未直接指明狂妄的究竟是安提戈涅，还是另有其人。当读者对这个英勇的弱女子抱有同情之时，阿伦斯多夫却借由情节的分析发现了安提戈涅自身的问题所在。读者从片面地责备克瑞翁，转而发现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两人真正的问题所在：克瑞翁颁布法令违抗传统，曝露死亡，而安提戈涅自杀，否定了自己对神法的信念，失去了抗争的力量。两人都受制于对永生的渴望，难以抗拒真正的命运，恰与标题中的“反抗命运”形成张力。克瑞翁与安提戈涅都不那么高贵，都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克瑞翁反抗命运，无法成为最好的国王，安提戈涅只想成就自己的高贵，更不能引领国家。

何人能真正高贵？何人能真正摆脱命运的束缚，不再恐惧死亡？何人能真正成为国家之王？阿伦斯多夫在结语部分，分析尼采、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对肃剧的基本态度。尼采批评苏格拉底

传统,他认为传统对真理的看法太过乐观,真理由恢复那可怖的模样,而肃剧能给人带来面对真理的勇气。肃剧的经验就是哲学的经验,二者并不冲突。阿伦斯多夫将对苏格拉底的分析放于对尼采的分析之后,或意在指出苏格拉底的态度与苏格拉底传统不相同。苏格拉底认为哭哭啼啼的肃剧会让人变得更加软弱,无法直接面对死亡。虽然肃剧中的英雄奋勇杀敌,看上去很勇猛,但他们认为这样的英勇能为他们赢得不朽。也即是说,英雄们还是无法顺应死亡,接受死亡,依然渴望那种本不应属于人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论述被放到了最后。《诗学》谈及肃剧不仅能帮助人们净化怜悯和恐惧,还能帮助读者接受人必有一死的宿命。

行文至此,已能明白阿伦斯多夫对何者为王的回答了。阿伦斯多夫也认为这个答案亦是索福克勒斯肃剧中隐藏的答案。能高贵地接受死亡的人方能为王。如何找到这样的人?阿伦斯多夫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作为落脚点,主旨也较为明确:历经肃剧训练,能顺从地接受人的命运之人。以更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得道之人,方能为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自然是属于真正的王者。哲人与王者,在此地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区分。

古老的哲学与王者,与修身的政治教养并不可分开。但历经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哲学与王者修为逐步分离,于是民众心中对文学、哲学的质疑与否定已越来越明显。这种反诘与否定,已经进入了现今大学的课堂,进而影响着我们的修德进业的积极性。文学何用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文艺理论所能回答,即便理论家们深入回答了该问题,民众们也会对深刻的理论答案不以为然:那不是他们的专业。诸多理论上升到更高的云层,不再贴近地面。理论家们在云层之上,为阳光所伤,不再有力量回归洞穴。无人带来光明的信息,洞穴也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理论的艰深突显了理论家们以及从事理论研究者的聪明,却拉大了具体文学文本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专业成为文学科目的划分标准,也挖掘出普通大众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巨大鸿沟。理论、专业等衡量标准进入文科大学教育,使我

们的心智忙于理解纷繁的理论,却没有精力与时间在文学经典的帮助下反思人生,考察自己的言行。一旦得半日闲暇,便将全部的时间交给电视、电影与流俗歌曲,不知不觉中已深受现代传媒影响,而经典大师的教育已完全被大众所遗忘。同时,大众们又按自己的心情对现代传媒做出选择,逼迫现代传媒以大众们的心情为旨归,尽管传媒会赢得市场,却难以坚持自己的价值与判断。文学无用论的情绪直接影响到大学教育,以至于读书无用的想法开始在普通民众中蔓延。遗憾的是,不少坚定的学者仍然在系统地对普通大众宣讲高深的理论,而与此同时大众们却在积极地关注现代传媒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如何重新引导我们直接面对文学经典,并细细品味大师们的思索,将是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我们牺牲掉沉迷于快乐而又舒适的现代传媒的部分时间,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文本,随大师们一起反思言行,提升品位,和睦家庭,安定国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不能被文学研究完全抛弃。文学文本,尤其是戏剧文本,关注人的言与行,不仅能反映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能让作为读者的我们跟随大师一起反思人的言辞与行动。“听其言而观其行”,真正实现根本意义上的修身,而非显得很高明的样子。

本文系阿伦斯多夫研究作品之一,文本关注情节,发人深思,应是努力复回经典文学活力的有益尝试。本书翻译由四位译者分工合作:引言与结语由欧阳霞翻译,第一章由蒋丹翻译,第二章由江欣柯翻译,第三章由袁莉翻译,笔者统校。全书还请廖一清全文通读,谨此致谢。刘小枫先生要求严格,对本书译文数次提出整改意见,笔者水平有限,或恐有负先生苦心。文中所犯之错,理应由本人承担,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2012年12月2日

致 谢

很多人对写作此书做出了贡献,在此笔者向他们表达真挚的感谢。第一章和第二章此前刊发过,收入此书已修订和扩展。第一章原题为“政治理性主义的限度:《俄狄浦斯王》中的启蒙与宗教”,刊于 *Journal of Politics*, 66. 3 (August 2004), 页 733 - 799, Southern Political Association, 2004, 获得剑桥大学出版社认可收录于此。第二章节原题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盲目信念与政治理性主义”, *Review of Politics*, 70:2 (春季卷 2008), 页 165 - 189, 获得 *Review of Politics* 和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的许可收录于本书。笔者很感谢 *Journal of Politics* 和 *Review of Politics* 允许笔者使用该材料。

感谢大卫森学院埃尔哈特基金会 (Earhart Foundation) 以及人文国际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给予的慷慨的基金支持。笔者也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雷尔 (Beatrice Rehl), 他为笔者提供了最有价值和最及时的建议、鼓励以及帮助。笔者同样向那些提供深刻而有益建议与评论, 以及在重要方面帮助笔者修改手稿的无名评论家们, 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大卫森学院的施劳德尔 (Kristen Schrauder) 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夏贝尔 (Shari Chappell) 的帮助, 柯亨 (Ronald Cohen) 认真负责, 严谨的作风对此书的修正和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布鲁姆 (Allan Bloom) 同在芝加哥大学研习索福克勒斯, 对笔者来说,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讲座、作品和例子, 教会了笔者重视从过去的伟大诗人和哲学家身上寻求智慧。与格雷 (David Grene) 同在芝大研习索福克勒斯, 亦荣幸至极。

笔者向凯尼恩学院(Kenyon)和大卫森学院那些充满活力生机的学生致谢,他们参与了索福克勒斯课程,还教会了笔者很多有关此戏剧的内容。笔者从该两所学院里的同事中也学到了很多,特别是韦尔斯(Stephen Wirls)。笔者也向鲍曼(Fred Baumann)、鲍洛金(David Bolotin)、丹豪泽(Werner J. Dannhauser)、高兹(Steven J. Kautz)、梅吉尔(Rafe Major)、欧文(Judd Owen)、鲁德曼(Richard S. Ruderman)、肖傲(Brian J. Shaw)和斯托弗(Devin Stauffer)致谢,他们阅读了笔者部分手稿,所提意见深刻,建议有益,亦有友好的鼓励。

最后,笔者向家人给予的所有支持表示感谢。可爱的孩子们,露西亚(Lucia)和玛提亚斯(Matias),他们于不知不觉中给予巨大帮助,正是他们的爱意、耐心和开朗支持着我;爱妻亚历杭德拉(Alejandra Arce Ahrens Dorf)给予我长期的支持,慷慨大方,于我必不可少。创作期间,妻子明智的建议,精神上的鼓励,正是爱的见证。有她,才有我创作的灵魂,而言语却无法传达我的感激。此书应献给爱妻。

引言

[1]自上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爆发冷战,遍及世界的冲突日益反映出自由主义及其理性主义者的命题遭遇到一种宗教性的挑战,这个命题即:理性是我们“唯一的救星和指南针”(洛克,1988,182)。宗教具有永久的政治重要性,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事实,而这一事实着实令人惊讶,它绝非仅仅假定,冷战的终结兴许会宣告“历史终结”的来临——宣告“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全球化乃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福山,1989,4),^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也增强了自由主义奠基者们的启蒙信心,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宗教热诚……会随着自由与启蒙的增长而消亡”(2000,282)。^②鉴于现代政治理论明显倾向于低估宗教的力量,考虑前现代的、古典的宗教论析和政治启蒙,就显得合理。正如本书所要表明的那样,索福克勒斯的忒拜剧清楚而生动地建立起了这种论析。

在现代时期,尼采尤为重视索福克勒斯笔下宗教的反理性主义以及政治理性主义论题的重要性,而尼采正是后现代主义最深刻的哲学资源。的确,尼采对自由民主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发起的攻击,对后现代世界来说十分重要(参罗蒂[Rorty],1989,27-30,39-43,61-66,96-121;1991,32-33),但尼采的攻击恰恰借用的

① [译按]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已有中译本,但未作原文编码,难以查询,未采用。

② 托克维尔自己并未曾拥有这样的自信。参2000,283-284,510-511。

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笔下众英雄的悲壮形象 (tragic grandeur)。尼采争辩道,苏格拉底建立和体现的是懦弱、武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世界观的肤浅乐观主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阐明的肃剧世界观,它勇敢而诚实地面对这个世界:对人的理性而言,真实的世界混乱、残酷,而且最终无法看透。^①然而,世界的冷漠和冲突这一景象并未击碎肃剧的人生 (tragic human being),毋宁说,肃剧的人生反倒满怀爱意地肯定“生存的原初快乐”,肯定存在内核中 (at the heart of Being) 的“永恒苦难”,进而颂扬“个体世界游戏般的建构和解构,视之为原初快乐的流溢”(1967, 105, 112, 142)。肃剧诗人及其笔下的英雄们“强有力的悲观主义”(pessimism of Strength)使得他们得以建立并完成一种肃剧文化,直面生存的悲伤,存在的神秘以及对生命的肯定,“即使置身最怪异、最艰难的问题之中,也要肯定生活”。^②希腊人的肃剧时代构筑的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最深刻、最高贵的文化,这种文化“肯定了我们令人惊异的崇敬感”(1967, 88; 另参 87; 93 - 94)。

可是,苏格拉底毁灭了这个文化,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取而代之,这种文化基于一种乐观的、反肃剧的“信仰”或“幻象”,即相信理性“能够穿透存在深渊的尽头”,相信幸福是生活的本来目的,理性能够引领人们走向幸福,进而相信,基于理性的生活是一个人的最佳生活方式(1967, 95 - 97; 也参 86 - 88, 91)。因此,苏格拉底“是世界史的转折点和所谓的漩涡”(96)。苏格拉底所建立的文化就是存留至今的我们的文化,其特征是“乐观主义赢了,理性主义、实践的和理论的功利主义日益流行起来,还有民主制也流行起来”(21, 重点为原文所加;另参 109 - 114, 91)。然而,苏格拉底式

① 1967, 17 - 18, 89 - 90, 94 - 97, 106; 另参 1954a, 473 - 474, 478; 1969, 272 - 273。

② 1967, 17 - 18, 文中重点; 1954a, 562 - 563; 另参 1968, 434 - 435, 448 - 453。

政治理性主义的胜利预示的是“人的全面蜕化”，因为，苏格拉底式文化不仅仅沉溺于其对世界的理性理解，沉溺于其对理性的自相矛盾的“信念”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式文化由于无力[3]直面人的生存的高贵肃剧性而声名狼藉(1989, 页 118; 重点为原文所加; 另参 54, 103 - 104, 112 - 114, 158 - 159)。

快乐的“末人”民主而温和，仿肃剧(subtragic)而似人(subhumanly)，为了避免此末人的最后胜利，自封“第一肃剧哲人”的尼采呼吁复兴肃剧，重建一种肃剧的与尚武的文化，此文化拒斥政治理性主义，也“肯定消逝和毁灭……[并]欣然接受反对和战争”(1954b, 128 - 130; 1969, 273, 重点为原文所加; 另参 274)。

是的，我的朋友，请相信我吧……肃剧的重生……苏格拉底时代已经终结……只有勇敢地成为肃剧人，你才会获得救赎。(1967, 124; 另参 99, 106, 121 - 123; [译按]据英文直译)

如果理性主义者苏格拉底预示了准精神性的(subspiritual)、似人的末人，那么反理性主义者，即“希腊肃剧的苦难英雄，俄狄浦斯或普罗米修斯，则是尼采 übermensch[超人]的原型”。^①

尼采提到最能代表肃剧世界观的典型人物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② 首先，俄狄浦斯真诚面对世界，勇气可嘉，还“有一双勇敢无畏的眼睛”(1989, 161)。其次，

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不幸的俄狄浦斯这个希腊舞台上最悲

① 斯尔克(Silk)和斯特恩(Stern), 1981, 296。另参丹豪泽(Dannhauser), 1974, 114 - 115。有关索福克勒斯的重要性，尤其是俄狄浦斯的重要性以及尼采对这些内容的思考，参斯尔克和斯特恩, 1981, 162, 255 - 257, 272。

② 尼采赞赏的另外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肃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是一位极受崇敬的神。